

编辑故事



他们批量离场了

很难想象，我主持的《文艺报》“编辑故事”版已经整整持续了三年。最初尝试时，并没有宏大的想法，更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只是想先做了再说。等到一期期地办下来，倒也有了感情，更因为一期期作者的汇集而渐渐形成了一个作者群，这些“群众”在我这个群主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出版人队伍。他们曾是或仍然是全国各出版集团或出版单位的掌门人，或是或仍然是颇有风格、颇有看头的资深编辑或青年才俊。这支队伍越来越大。三年猛然回到，一种从七八条枪白手起家干到成建制、有规模的队伍的感觉，是十分令人自豪的，也为我的出版职业生涯打上了另一种烙印。

本来在岁末年初，我都会在首期包办这个版面，对过往一年的出版形势作一个个人观察。不过，今年我没有这样做，一是这几个月非常繁忙，二是个人心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三是出版业出现了一些我难以预测、难以判断的情况，我对出版的自信心明显有了些“哆嗦”。我本来可以喜滋滋地在一年后终断自己的职业生涯，但现在很难预料。

让个人心境发生微妙变化的不仅仅是外部形势，还因为一些和我朝夕相处的出版人批量离场了。近年来，与其他国有企业的情况一致，出版单位负责人实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即在一个任期内（多数是三年）结束时进行评估，以便决定是否可以续任。这本不是什么新鲜做法，过去二三十年一直如此，但如果优秀的出版社社长或总编辑不满一个任期但不能被任命，就会出现批量集中离场的局面，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需要研究的有两个问题：作为需要长期经营的出版业，一个合适的任期以多少年为妥，以及在不到一个任期时是否可以缩短任期。

我因为还有一年就要退休，目睹了与我同年或年龄相仿的优秀出版人的离场，心有戚戚焉，大有一种“荷戟独彷徨”的感觉。

因为曾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多年，我与全国人民出版社的社领导和编辑相识甚多，与辽宁人民出版社社长蔡文祥是多年的朋友，每年在各种展会上相遇总是格外亲热。多年前我便知道他在全身心地投入两个百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史的浩大出版工程。在即将完成这两大工程之际，也是他刚刚离场之际，我请他书写了他这“十年磨两百日”的不凡经历。

新年刚过，我的前辈、著名摄影家、编辑家晓庄驾鹤仙去。我和晓庄之间有很多故事，我也曾有计划为她写传记，现在似乎也没有可能了。我只能请我们的优秀年轻编辑、也是晓庄两部图书的责任编辑曾偲写了篇短文，写出晓庄这位享誉世界的摄影家和出版同行的一鳞半爪。

每年的新年祝福往往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可是，这毕竟是祝福，却未必是“现福”。

——主持人 徐海

十年之约

一切始于辽宁出版集团2016年秋在北京举办的那个策划研讨会。当“双百卷”蓝图在研讨会上徐徐展开时，会议室里先是寂静，继而响起低低的惊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传播历程作全面系统的考据与梳理，国内百卷、世界百卷——这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的出版工程，更是一项庞大的基础性学术工程，一项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传播史绘制精密“谱系”的艰难跋涉。

作为出版人，我记得当时心中抑制不住沉甸甸的兴奋，充满期待。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问号：文献散佚世界各地，版本考证如大海捞针，学术标准必须无可指摘，时间跨度长，工程浩大……我们这支队伍，真的能建成这座连接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之桥吗？

这个问号，成了我们十年“长征”的起点。

字里行间的深耕

编辑“双百卷”的日常，是名副其实的故纸堆里的工作。

我们面对的，是一百多年来各种纸张上或清晰或模糊的中外文文献，不同语言交织的各种文本。为了一个早期译本的出版时间、不同的版本，我们的作者可能要要在数个档案馆里“泡”上数周；为了核实一段引文的确切出处，我们需要作者跨洋连线，恳请海内外学者协助查阅原件。屏幕上的文档，标记从红色（待解决）到绿色（已核实）的过程，漫长而焦灼。反复退改的稿件，期待它的早日返回。

我清晰记得，为了研究考证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所依据的底本究竟是日文版还是英文版；为了研究考证译者的真实身份和生平事迹，澄清讹传，考证某经典著作译本中某个关键词语的流变，我们和作者、专家一起比对了不

同年代、不同译者的版本，以及当今的中外权威版本，参考大量资料，最终理清了那条重要的思想接受脉络；为了核对书稿中的引文，使用各种工具查阅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当结论浮现时，那种豁然如晨曦微露。那一刻，疲惫被巨大的欣喜冲刷——我们仿佛亲手擦拭了一颗被尘埃暂时遮盖的星辰，让它重新在思想的天幕上闪光。

这就是我们编辑工作的日常：与细节较真，与时间赛跑，在浩瀚的文献中，做最专注的“考古学家”和“侦探”。一支笔，一台电脑，一盏灯，一杯浓茶，便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深知，每一处考证，每一次校订，都可能影响后世学者对一段思想旅程的理解。这份重量，让我们对每处细节都心怀敬畏。

工匠精神的打磨

出版工作常提“工匠精神”。在这十年中，“双百卷”工程于我们编辑而言，不是口号，正如丛书总序所言，它是融进编辑心头的“三重敬畏”，是工作时时中那杆永不倾斜的准绳。

敬畏经典。我们所编辑的内容，是人类进步思想的瑰宝。有时常常想象百年前的读者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时是多么的震撼。因此，动笔编审校改时，我们常怀战战兢兢之心，引文、术语、标点、注释、参考文献，每处每字都须经得起严苛的检验，让四面八方的读者，能准确地理解接收到那些穿越时空的思想光芒。我们的职责，便是让这光芒通过我们的工作，更加清晰、准确地传递。

敬畏先驱。我们编辑整理的是先行者的足迹。那些在暗夜中率先擎起火把的翻译家、出版家、革命家，是他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之路。他们的勇气与智慧，在暗夜与恐怖下传递真理火种的艰辛，常常让我们在编辑工作中肃然起敬。我们遇到无数个令人动容的细节：翻译工作的艰难曲折，秘密印刷、传播发行的勇敢，追求真理的执着……展读他们的文献，仿佛在与他们隔空对话。我们做的，不仅是技术性处理，更是对先驱者精神的一次次鞠躬与致敬。

敬畏责任。编辑是出版流程的“守门人”，也是学术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两百卷书，开启了“通考性研究考证的先河”，被学界称为“马考”，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基础。我们深知，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是出版的生命线。为此，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编审校工作机制，“不行”“不够”“再改”“再查”“再校”成了我们编辑工作的口头禅。



蔡文祥

对学术严谨规范的坚持，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这是对历史、对学术、对读者必须负起的责任。这份敬畏，让我们在无数个可以“差不多”就放行时，选择了“再坚持一下”。

团队的力量更能行稳致远

“双百卷”，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十年长路，我们有幸置身于一个闪烁着理想与协作光芒的团队——一个由杰出学者和敬业编辑组成的共同体。

数百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作者队伍，为“双百卷”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写作基础。编辑与作者的协作，是用出版的专业，配合学术的严谨，共同向完美无限趋近。除了研讨会、视频会上的交流沟通辩论，更多的是深夜邮件往来，常与年逾古稀的专家为了一个考据细节电话讨论至深夜，也常与年轻学者一起如何规范体例、查证史料、理清传播脉络而反复磋商。

编辑团队内，则是另一种温暖而坚实的陪伴。大家共享查到的珍贵资料，为某个棘手难题集体“会诊”，在加班到深夜时互相提醒“该回去了”，在阶段性目标完成时那份无言言说的默契笑容……正是这点点滴滴，汇聚成星河，照亮了那些看似枯燥甚至艰难的日子。是团队，让坚持变得可能，让十年漫长的旅程充满力量。

十年磨就的答卷

2021年4月，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礼的重大出版项目，第一个百卷如期问

世。当看到它被郑重地陈列在重要成果展上，被国内外图书馆收藏，被学界同仁频频引用，所有伏案的艰辛，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沉甸甸的欣慰。

如今，第二个百卷也即将收官。抚摸着这个即将付梓的校样，我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页页文字，而是一部用三千多个日夜、用十年光阴，集体智慧与心血共同写就的出版答卷。

我们回答的，是如何在信息碎片化时代，进行一场系统性的思想整理；我们证明的，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学术出版中的不朽价值；我们提供的，是一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精密“地图”，为未来的理论创新与学术研究，夯实不可替代的文献基础。

回望：编辑的“慢”与“重”

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们用十年时间做了件“慢”事；在这个热衷轻阅读的环境，我们打造了这样两套百卷重量级的著作。

常有人问：值得吗？

我的答案，写在每一页反复打磨的校样里，刻在每一次严谨考证的抉择中，融在每一卷芬芳洋溢的墨香里。

编辑不仅是文字的匠人，更是精神的守护者、文化的接力者、历史的备案人。编辑工作，表面是与文字打交道，实质是与哲人对话、与时间赛跑、为文明续脉。我们的初心，是在浮华喧嚣中守护思想的严肃与深度；我们的使命，是以专业与坚守，将人类进步旅程的精华，以最可信赖的形式传递给未来。

“双百卷”即将合拢。十年“双百卷”，于我们编辑和出版人而言，是一次职业生涯的淬火，更是一场灵魄的“朝圣”。这十年，我们从一个追求“编好每一本书”的编辑，成长为理解“为何要编这些书”的出版人。时间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让那份对经典和先驱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对使命的担当，愈发清晰而坚定。

合上最后一卷校样，窗外已是华灯初上。城市在快速运转，而我们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一场典籍的“慢雕刻”。案头那盏陪伴了三千多个夜晚的灯，此刻显得格外温暖——它照亮的不仅是一张书桌，更是一条连接过去与现今、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之途。

这条路，我们走了十年。这条路，还将一直延伸下去。

（作者系辽宁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原社长兼总编辑）

两代人的显影：与晓庄的书之缘

曾偲



曾偲

好几趟，总算把她电脑里的一万多张照片都看了个遍。看完这一万多张照片，才能明白晓庄走过了怎样的一生。

16岁加入部队随军拍摄；1952年，转业至新华日报社任摄影记者；1970年，下放至南通，仍从事摄影工作；1980年，调任至江苏人民出版社，后创办摄影刊物《光与影》；1992年，策划编辑出版了《中国三峡》画册，年届花甲三上三峡组稿摄影，后来此书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遭遇车祸，卧床近两年；1998年，终于可以拄拐行走，开始思考整理底片；1999年之后，又忙里偷闲地跑了不少地方，以“寻找影像中人今昔对比”的方式完成了与早年摄影作品的闭环。

两本非典型摄影集的诞生

我陆陆续续看完晓庄老师整理出来的照片后，便开始着手写选题策划案。

1933年出生的晓庄，是新中国最早的女摄影家之一，亲历并记录了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些照片大多是她在《新华日报》任摄影记者时所拍，新闻要素及图说完整，保证了影像的新闻性与历史性。不在报社工作后，她仍然一直保有摄影的惯性。所以，除了“老照片”，晓庄也期待在图文集中再呈现一点“新照片”。

基于此，我当时按“穿越中国”“小人物的中国史”“运河两岸有人家”三个主题写了不同的策划。后来落地执行的是“小人物的中国史”“运河两岸有人家”这两个主题，分别精选269张、345张照片入册，配合文字介绍与图片说明，形成了《面孔：1950—1980年代》《运河两岸有人家：晓庄镜头下的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两本书。

《面孔》起初的书名叫《小人物的中国史》，定位非常明晰——用小人物的生活展现时代变迁。确定书稿主题后，我和晓庄老师以及本书序言的撰写者孙慨老师开始了漫长的选片之路。除了当面沟通，我们在线上也保持着非常频繁的交流。就这样选片、排版、增删照片、再排版若干个来回后，我们终于选定了269张富有代表性的人物肖像画，以期用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面孔展现逝去的时代。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文中照片背景知识及图说内容都是晓庄自己写的，语言平实朴素，就像摄影记者应该做

的——记录所看到的。

《面孔》出版后，我们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运河两岸有人家》的出版工作。该书图文并重，我们邀请丁宏、干有成、姚乐三位长期从事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学者撰写文字部分，提升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与可读性。

《面孔》排版时，我和晓庄老师达成的共识是“图片要大，要看得清表情”，到了《运河两岸有人家》，这一规则就不适用了。这本书里有非常多的组图需要集中呈现，比如《淮准修闸》一篇中，为了体现三河闸工程修建时的场景与新貌，共采用了9张图片，囊括工程建设、群众生活、风土人情及晓庄老师本人的工作情形。

组图的排版非常考验人，那时正值盛夏，初排时我几乎每天都扎在排版公司，一边和制版版员沟通，一边和晓庄老师通过语音视频线上交流。晓庄老师有她对照片美感的追求，刚开始也不太懂排版的规律，每每和我念叨“这张照片好，要放进去”“现在这样排不对，左右对调下”“横幅照片能不能跨页排”……这中间不可能没有争执。有一次上午正在排版，她发来一张完全不符合运河主题的照片坚持要用，我不同意。两人僵持不下，先挂了电话各自冷静。到了下午，晓庄老师发来另一张照片，更契合书稿主题，我赶紧一通夸赞，两人又和好如初。

此外，晓庄老师还有个心愿，我们也在在这本书里满足了。作为一位摄影家，她不光留下了拍摄的作品，也留下很多工作照。在《运河两岸有人家》中，我们在主题一致的前提下，放入了12张她的摄影工作照，时间跨度从1951年至2019年，眼看着她从穿着军装的小姑娘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手中的相机也几经变换，不变的是她永远像个女战士一样，怀揣着相机，到处捕捉可记录的瞬间。

“在做事”是毕生追求

我第一次见到“晓庄”这个名字，觉得这肯定是个笔名，后来才从晓庄老师口中得知此名来源。晓庄老师原名庄冬莹，“名字的意思就是冬天下了个女孩”，在部队时她觉得这个名字有重男轻女的痕迹，便一直用“晓庄”这个笔名。后来转业至新华日报社，她正式改名，从此摄影界便有了晓庄。

从改名就可以看出，晓庄老师一直在用一种不服气的心气工作。“我坚持吃苦在先，是干

得最卖力的一个，绝不比男同志差。”女性身份给她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同时也赋予了她不一样的视角。

《面孔》中收录了许多妇女儿童的照片，相较于男性，女性与儿童在晓庄的镜头下更富有表现力。晓庄老师说过，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男性摄影记者拍一些女性时，她们都会害羞，躲得远远的；而她去拍照时，她们都会打扮得很亮丽。比如，1964年她去江都拍妇女插秧，劳动能手们都戴上了银镯子、银项链、银簪，看到晓庄踩进秧田，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她们靠拢，她们劳动得更起劲了。而当她给孩子拍照时，他们总爱追在她的身后，既好奇又兴奋。所以她镜头下的儿童，呈现出儿童应有的样子——稚嫩灵动。

晓庄老师的要强表现在方方面面，也许这就是创作者应有的姿态：能够自己做的，绝不假手于人。偶尔她会打车来出版社，我说给她叫出租，她还是用她惯有的骄傲说：“不需要，我会用打车软件。”同时，她还坚持不开免密支付，说：“老太太可没有糊涂，密码我还是记得的。”可不是嘛，她不光记得密码，还几乎记得所有整理过的照片，即便是用手机拍照，她也会在发来照片的同时，附上简短的文字说明。

我问晓庄老师最喜欢什么样的照片，她给我看了她的获奖作品《踏碎银波》与《生机勃勃》，前者拍了一群湖水中惊起的鹅，后者是几只刚刚出生的小鸡。这两张照片都非常生活化，远不及她拍摄的新闻照片那样震撼人心，但她说这些才是她喜欢拍的。我想这些细微处的观察，才是晓庄老师的可贵之处。

晓庄老师总说：“老太太这一辈子还干了点事。”每每听到她讲这句话，我们这些熟知她的人都会大声纠正：“可不是一点事，是很多很多事。”

是的，还有谁能像她一样，从16岁拿起相机，就这样拍了一辈子，留下了作品与思念。

我的文字无法表现晓庄老师精彩的一生，道阻且长，可以与喜爱的事业相伴一生，幸福至极。这是她教我的。

2026年1月5日，我收到了晓庄老师微信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她亲人代发的，正式告知她辞世的消息。

晓庄老师的微信签名是“急脾气”，这段圆满于94岁的人生在“急脾气”的主导下，近些年出版6本图文集，办了4次摄影展览，可谓不虚此行。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副编审）